



辞书 论集

ISHULUNJI 上海市辞书学会论文选

辞书 论集

上海辞书出版社

辞 书 论 集

——上海市辞书学学会论文选

上海市辞书学学会 编

知 识 出 版 社

辞书论集

——上海市辞书学学会论文选

上海市辞书学学会 编

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古北路 630 号)

(沪 版)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上海东方印刷厂排印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 10.125 字数 217,000

1987 年 12 月第 1 版 198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 7-5015-5152-9/G·39

定价: 2.00 元

序

汤季宏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辞书是工具书，是书籍中的利器，是攻克科学堡垒的利器。

辞书从学术价值上讲，具有高度的准确性和极大的权威性；从使用价值上讲，又具有可以代代相传的长久性。辞书的这“三性”是其他书籍无法与之相媲美的。近年来不少书籍的发行量时起时伏，而唯独辞书的发行量稳步上升。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辞书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和作用。

中国编纂辞书的历史悠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辞书事业有所发展。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辞书事业惨遭破坏。当时人们能够买到的辞书，只有一两种。粉碎“四人帮”以后，尤其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辞书事业迅猛发展。辞书门类逐步齐全，层次也在增多，开始形成系列。

在辞书出版事业繁荣的基础上，辞书理论的研究也有进展。辞书编纂的要求高，难度大，没有一定的理论指导是不行的。近年来，分布在出版、教育、科研以及其他战线的辞书爱好者和辞书编纂家，致力于辞书学研究。

为了把上海的这支辞书编纂队伍组织起来，为了巩固和发展辞书学的理论成果，一九八二年成立了上海市辞书学学会。上海市辞书学学会是一个群众性的组织。两年多来，学会在上海辞书出版社、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汉语大

词典编纂处等许多单位的支持下,开讲座,办展览,做了一些普及辞书学的工作,同时也开展了一些对内、对外的学术交流活动。在一九八二年七月举行的上海市辞书学学会成立大会上,我们收到了辞书学者提交给大会的论文十八篇,在一九八四年一月举行的上海市辞书学学会首届年会上,我们收到了会员们提交的论文十六篇。经学会各专业组评选,收入本书的有十九篇。从学会举办的辞书学讲座的讲稿中,选了七讲,收入本书,以飨读者。参加本书编辑工作的有:王德春、邓伟志、刘如水、江希和、孙厚璞、杨祖希、陈光裕、陈炳逵、梅家驹、施伟达、胡均潘汉超(按姓氏笔画为序)。他们为这本论文选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严格地说,辞书学的理论研究工作,处于起步阶段。最近,不少学者建议办辞书学研究所,建辞书学专业,开辞书学课程,使得辞书学的科研、教学、编纂出版协调发展,让辞书学为中国的四化建设作出更大贡献。我想,实现学者们的这一愿望是指日可待的。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

目 录

| | |
|-----------------------|----------|
|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辞书学 | 杨祖希(1) |
| 部首查字法的几个问题 | 杭 苇(18) |
| 辞书和逻辑 | 徐庆凯(27) |
| 词典编纂学的新课题 | |
| ——评《朗曼当代英语词典》 | 陈炳迢(40) |
| 比较辞书质量的一个客观化方案 顾国庆 | 邓伟志(55) |
| 关于新《辞海》词目处理的几个问题 秦振庭 | 杨宝林(67) |
| 语词词典中专科术语的选词与释义 | 鲍克怡(79) |
| 语文词典对专科词的收列和处理 | 刘 凌(89) |
| 略谈古代汉语借词的溯源和准确释义问题... | 徐文堪(102) |
| 通假立目三题 | 陆锡兴(117) |
| 试论编纂汉语语义分类词典的意义和作用 | |
| ——兼谈《汉语同义词词林》的编写宗旨 | |
| 梅家驹 竺一鸣 高蕴琦 | 殷鸿翔(125) |
| 原本《玉篇》及其与中日文化交流 | 陈炳迢(133) |
| 传统汉语工具书的工具书——《小学考》 .. | 徐祖友(149) |
| 语言学 and 词典编纂 | |
| ——兼评苏联《英俄大词典》 | 王德春(162) |
| 英语、英汉词典对英语惯用介词的处理 .. | 吴 莹(183) |
| 从汉外成语词典谈到汉外成语的比较和研究 | 严庆禧(190) |
| 专科词典的系统性 | 梅家驹(203) |
| 年鉴编纂刍议 | 嵇 航(211) |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辞书学

杨祖希

辞书编纂的历史,源远流长。但是,辞书学之形成一门学科,却是二十世纪的事。根据不完全的资料,比较系统地论述辞典编纂法的专著,可能以《牛津大词典》的第一任主编默雷(James A. H. Murray, 1837~1915)于1900年出版的《英语词典编纂法的演进》为最早,比较系统地论述辞典学理论问题的专著,可能肇始于苏联语言学家谢尔巴(Лев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Щерба, 1880~1944)在1940年发表的《词典学一般理论初探——词典的基本类型》。各国百科全书将“辞典学”收作专条,最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见之于《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二版。1964年修订重印的《英国百科全书》第十四版,还没有为辞典学设置专条,也没有在有关条目(如“辞典”)中提到辞典学这个名称。直到七十年代出第十五版,它才收录了“辞典学”这个条目。百科全书有没有专条介绍,是衡量一门学科的成熟和流传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因此,如果将辞书学的兴起定为二十世纪中期,也许不是一种武断。辞书学是这样年轻,离开定型的程度很远。各国的辞书工作者都在根据本国的辞书编纂经验,就辞书学的内涵和外延进行自己的探索。在我国,自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辞书编纂出版事业春意盎然,一派生机。辞书事业的巨大发展,迫切要求具有中国特色的辞书学尽快建立。本文拟就建设具有中国特色

的辞书学(以下简称新中国辞书学)的必要性,我国已为辞书学作出的新贡献,新中国辞书学的主要内容这三个问题谈一点不成熟的意见,目的在于抛砖引玉,促进讨论的深入开展。

一、建设新中国辞书学的必要性

建设新中国辞书学的必要性何在?它的必要性在于:无论从指导思想,从社会发展,从学科本身来看,新中国辞书学要能够“立”得起来,发展下去,非从中国实际出发,走自己的道路,具有中国特色不可。

首先,从指导思想来看,任何学科的建立和发展,都离不开指导思想,不过有的是公开宣布,有的是讳而不言罢了。新中国的一切学科,是公开宣布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的,辞书学也不例外。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特征,是要求同各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列宁说:“一切民族都将走到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类型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列宁全集》第23卷第64~65页)毛泽东同志1938年在《论新阶段》中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认为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正是由于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创立了毛泽东思想,才使马克思主义这样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在中国爆发出了震撼世界的威力。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新中国辞书学离不开毛泽东思想的指导,这就必然要

求它从中国的具体实际出发，在辞书编纂经验的理论概括中具有中国特色。

其次，从社会发展来看。我国现在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是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同志集中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智慧，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庄严宣告：“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外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邓小平同志对毛泽东思想的创造性的发展，也是我们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总纲领和最基本的理论准则。它既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也是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我国的辞书编纂和辞书研究事业，正如我国的其他一切事业一样，不能不以时代摆在我们面前的总目标、总出发点为依归。

最后，从学科本身来看。辞书学是一门以辞书为研究对象的科学。它的主要任务，是对已经取得的辞书编纂经验进行概括和总结，使之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以便指导今后的辞书编纂实践。在理论科学和应用科学的划分中，辞书学属于应用科学。它的产生源泉是辞书编纂实践。它的发展动力在于辞书编纂实践的需要。它的力量和生命力，在于指导辞书编纂实践并同无比丰富、不断发展着的辞书编纂实践相结合。脱离辞书编纂实践的辞书学，既是不可想象的，也是无法存在的。辞书学要不脱离辞书编纂的具体实践，首先并且主要是不脱离本国辞书编纂的具体实践。在历史上和现实中，纯粹

摹仿外国，照抄外国经验的辞书是有的，但那是有损于国格、有损于民族自尊心的事情。新中国是已经独立了的社会主义国家，它的辞书编纂实践，不应该再走照搬外国辞书的老路。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辞书编纂实践闪耀着中国式的光辉，来源并服务于新中国辞书编纂实践的新中国辞书学，不能不具有浓郁而又独特的中国色彩。

怎样才能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辞书学，我国的辞书工作者正在不断地探索。但是，也有同志认为辞书学是国际性的学科，辞书所提供的知识大多数是全人类所共有的知识，科学和知识不应该有国界，用不到提出辞书学本国化的问题。诚然，辞书学所探讨和阐发的辞书编纂中的规律性东西，有许多是中外辞书所共同适用的；各国出版的辞书所提供的知识，有许多是不能打上一国的印记的。但是，怎样发掘和总结这些规律性的东西，怎样选择和介绍这些知识，却不能不受指导思想和一国国情的制约。任何国家的科学，都不能不从本国的实际需要出发，并以服务于本国的实际需要为目的。辞书学既然是一门科学，不能游离于科学发展的这一普遍规律之外。荷兰著名电影艺术家伊文思在论述电影民族化问题时说：“电影是国际性艺术，有它的国际语言，如何把国际语言和民族形式结合起来，还是个问题。这两者的结合是不容易的，但必须走这条路。”（《大众电影》1982年第12期）他认为很多国家的电影已经找到了民族化的道路，如日本、意大利以及拉美国家，包括美国。作为国际性艺术的电影，存在着民族化的问题，这是广大电影工作者所一致同意的。作为国际性科学的辞书学，存在着本国化的问题，也决不会产生“本国化”排斥“国际性”的误解。

也有同志担心，辞书学中国化的命题，强调立足于中国的

今天，会把中国古代的辞书编纂传统和外国有益的经验弃之不顾。这是一种误解。具有中国特色，无疑地应该立足于中国的今天，但是同时，它也要求正确处理继承和发展、借鉴和创造的关系。辞书学的中国特色，其实包含着两层意思：一是继承和革新中国古代的辞书编纂传统，使之适应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二是学习和借鉴外国辞书编纂经验和辞书研究成果中适用于我国的东西，赋予它们我国人民所易于理解和接受的形式，并加以丰富和发展。对于那些不适用的经验，不是简单地加以抛弃，而是以之作为借鉴，促使我们去进行自己的创造。这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辞书学，决不意味着对古代和外国的辞书编纂经验采取盲目排斥或盲目搬用的态度，而只意味着博采众长，融合提炼，在古今中外一切有益经验的基础上创造出自己独树一帜的经验来。

二、我国已为辞书学作出的新贡献

我国的辞书学研究，可以说是从三中全会以后开始的。建国以前，尽管各种辞书的前言、凡例、编辑说明等等实质上都是辞书学论著，但辞书学一词，始终未见诸于我国的辞书和辞书文献。例如，《辞源》1915年版和《辞海》1936年版中都没有“辞典学”这个专条。又据李大忠同志所编的《词典学论文索引》（《辞书研究》1980年第3、4辑），建国前发表的论文中，只有《汉字改造中词典编纂法的几个提议》（田锡安著，刊于1922年《国语月刊》1卷7期）、《分类成语辞书编纂法》（林语堂著，刊于1933年《语言学论丛》）等少数几篇，才在题目中使用了“词典（辞书）编纂法”这一术语。建国以后，1957年版《英华大辞

典》对lexicography的译义是“辞典编辑法”。1958年《上海外国语学院季刊》第1期上发表的张超人同志的《试论汉俄词典编纂法》一文，仍未提到辞典学。“辞典学”一词出现于我国辞书文献，也许以1959年辞海编辑所翻译出版的《百科全书·辞典及其他》（《苏联大百科全书》选译）为最早，其中刊出了《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二版“辞典学”条的译文。1979年出版的《辞海》三卷本，收录了我国自己编写的“辞典学”这个条目。我国的辞书学研究，虽然起步比国外为晚，而且目前亦仍处于襁褓之中，但是，由于党的正确领导和大力扶持，由于广大辞书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却已为辞书学作出了许多新的贡献，主要有：

（一）创立了“辞书学”这一术语

辞书学这门学科，国外都称作“辞(词)典学”。1979年上海市语文学会辞典组在学术活动中开始使用“辞书编纂学”一词，这一提法后来为其他辞书工作者所接受，并将它改称为“辞书学”。1982年出版的《简明社会科学词典》开始以“辞书学”立目。同年成立的上海市辞书学学会及其在1983年举办的讲座，亦以辞书学而不是以辞典学作为正式名称。“辞书”一词，可能来自日文，是日本借用汉字创造出来的，与辞典同义。传入中国以后，虽然仍有辞书工作者认为应从日文本义去使用它，即认为辞书等于辞典，但是它也被赋予新义：辞书是辞典和百科全书的统称。1979年版《辞海》的“辞书”条，即持这样的见解。随着辞书一词的广泛流行，辞典学在我国改称辞书学的情况日趋普遍。这一改称，应该说是我国辞书工作者的创造，至少有三方面的好处：（1）可以更明确地表示这门学科所研究的是有关辞典和百科全书的问题，而不致使人误以为百科全书不属于它的研究对象。（2）可以同我国辞书编纂的

传统相一致,我国的辞书文献(如1915年的《辞源说略》,1936年的《辞海编辑大纲》),通常使用辞书一词来囊括所有一切按辞典规格编纂的工具书。(3)可以同日常用语口径一致,有些日常用语,几乎只能使用“辞书”一词来构成合成词,才能名实相符。例如,“辞书工作者”、“辞书出版社”、“辞书研究”、“辞书学会”等合成词中的“辞书”两字都不能换成“辞典”,否则含意要狭小得多。辞书学的定名问题,同辞书学的内容相比,居于次要地位,但因定名涉及内容,所以在这里不能不略加论述。

(二) 扩大了辞书学研究的范围和对象

关于辞书学的研究范围,国外流行的见解是认为辞典学只研究辞典编纂的理论和实践,而不包括辞典编纂的历史。例如,关于辞典学的定义,《苏联大百科全书》第三版作:“语言学的一个部门,研究辞典编纂的理论和实践”;《英国百科全书》第十五版作:“辞典学——编纂辞典所遵循的原理、步骤和实际方法”;英国《语言与语言学词典》作:“应用词汇学的一个分支,研究词典编纂的原则和实践”。关于辞书学的研究对象,国外流行的见解是以语文辞典为主甚至以语文辞典为限。例如,上述三种工具书的“辞典学”条,都没有把百科全书包括在辞典学的研究对象之内。国外有些词典学家主张“名典”(阐释指物符号的词典)和“物典”(解说所指之物的词典)应该泾渭分明,严格区别,并认为物典不过是采用词典的排列法而已,不能算作真正的词典,因此不是词典学的研究对象。^①据黄建华同志在《法国词典学一瞥》中的介绍,法国词典学界存在着这样一种现象:“百科性和专科性词典这么发达,而却很少见有什么词典学专著探讨这方面的问题,反之,研究语文词典的

^① 参看黄建华《法国词典学一瞥》(《辞书研究》1980年第2辑)和《词典论》(同上,1983年第1~4期)。

专文专著却随时可见,无法尽读。”国外对词典学的解释和理解,基本上都是将它视作语文词典编纂学的同义词。无论是苏联谢尔巴的《词典学一般理论初探》,或者是捷克斯洛伐克兹古斯塔(L. Zgusta)等编的《词典学手册》,美国豪斯霍尔德(F. W. Householder)和萨波塔(S. Saporta)编的《词典学问题》,以及美国的北美辞典学会、印度的辞典学会等等,研究的几乎都是语文辞典问题。

我国辞书工作者对辞书学的研究范围和研究对象的想法,比国外宽广得多。从《辞书研究》的办刊方针以及四年来它所发表的文章来看,我国辞书工作者从“辞书学是辞书编纂经验的理论概括”这一基本观点出发,一般认为辞书学的研究范围应包括辞书编纂的理论、实践和历史;研究对象应包括语文辞典(包括字典)、专科辞典、百科辞典、百科全书、双(多)语辞典、综合性辞典和特种辞典(如机器翻译辞典、算法语言辞典等),并认为在工具书学形成以前,辞书学还应该担当起工具书学的使命,将辞书以外的其他工具书(年鉴、手册、索引、书目等)也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这些工具书在编纂上与辞书有许多相通的地方,它们也是需要研究的,在工具书学形成以前,研究它们的最合适的学科不能不推辞书学。我国辞书工作者提出的辞书学研究范围和对象的新见解,可以使辞书学研究有更广阔的驰骋天地,从而有助于辞书学内容的充实和深化。

(三) 开展了中国辞书史的研究

我国有着悠久的辞书编纂历史,积累了丰富的辞书典籍,但是在“言必称希腊”的时代,却很少有人去发掘和探索。《辞书研究》创刊以来,先后发表过从《尔雅》到《康熙字典》的研究文章,并对我国少数民族的辞书(如西夏文辞书、满文辞书、

《突厥语词典》等)也作了初步探讨。对于我国在世界辞书类型中特有的品种,诸如韵书、类书、政书、学案、谱录等等,也开始重视。研究工作虽然还不够系统,但终究已经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填补了世界辞书史上的空白。

(四) 开始形成自己的辞书编纂理论

三中全会以后,我国三部规模较大、流传较广的辞书——《现代汉语词典》、《辞海》和《辞源》先后正式问世,它们都总结了自己的编纂经验。正在编纂中的一些大型辞书,如《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医学百科全书》、《经济大辞典》、《哲学大辞典》、《中国历史大辞典》、《汉语大词典》、《汉语大字典》、《英汉大词典》等,也都对辞书编纂的客观规律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三中全会以来,我国辞书编纂已经取得和将要取得的经验,以及依据这些经验获得的理性认识,普遍具有中国特色。它们所涉及和阐释的辞书学内容,笔者个人认为,在深度和广度上较国外有过之而无不及。由于这方面的内容异常丰富,为了避免本文篇幅过长,将另撰专文介绍。

(五) 广泛地进行了工具书排检法的研究

汉语工具书的编排和检索方法,由于汉字不同于拼音文字,要比拼音文字工具书丰富得多。工具书的排检法,大致可按字形、读音、词义分为三大类。字形排检法国外主要使用字顺法(包括词顺法),汉语却还有部首法、笔画法、号码法(目前最流行的是四角号码法)等等。音序排检法几乎不为音位文字(如各种拼音文字)工具书所采用,音节文字(如日文)工具书虽加采用,但是不象汉语工具书那样方式众多。汉语工具书的音序排检法,有汉语拼音字母、韵目和注音字母三种。词义排检法包括分类法、主题法、时序法、地序法等,它们虽然常为国外的年鉴、手册、索引、书目等工具书所采用,但辞书采用的却

不多。国外出版的百科全书、百科辞典和专科辞典，几乎都将词条的分类视作“营业秘密”，秘而不宣。西方出版的百科全书，在古代和中世纪是采用分类排检法的。1751~1780年出版的狄德罗《百科全书》，采用的是字顺法，因此，1782~1832年间，巴黎一家出版社曾将该书按照分类法加以改编，出版了《分类百科全书》。现代意义的百科全书从十八世纪开始出版以来，流行的排检法是字顺法或词顺法。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开始出版的《法国百科全书》，曾尝试恢复分类法，但它直到现在还没有出齐，影响不大。我国古代的百科性辞书（类书、政书、农书、学案、谱录等），绝大部分都是分类编排的，由于缺乏索引，检索很不方便。现代出版的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医学百科全书》等）和《辞海》百科部分各分册，都采用分类排检法。专科辞典采用分类法的也很多。因此，就现代辞书而言，词义排检法的采用在我国比在国外来得普遍。我国的辞书提倡在质量上取胜，没有考虑过“营业秘密”问题。为读者着想，百科性辞书采用词义排检法，确实可使他们从使用辞书中获得检索性和可读性并重的好处。排检法是辞书学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以上所作的简略介绍，表明我国工具书的排检法确实有着自己独特的不同于外国工具书的理论、传统、原则和方法。

三、新中国辞书学的主要内容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辞书学，这是全国广大辞书工作者共同的奋斗目标，也是他们的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因为是出发点，所以在前进的道路上，已经开始表现出许多不同于国外辞典学的特点。现在和今后需要努力的，是如何使具有中国